

重 读 马 克 思 书 系



马克思
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

冉昊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马克思
和未来社会主义道路

冉昊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和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冉昊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8. 5

(重读马克思书系/何中华, 丁少伦主编)

ISBN 978-7-5488-3171-6

I. ①马… II. ①冉…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②社会主义—研究—现代 IV. ①A81 ②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6798 号

出 版 人 崔 刚
策 划 人 杨 峰 丁少伦
责任编辑 乔俊连
装帧设计 刘 畅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86131720
发行热线 0531-67817923 86922073
印 刷 济南新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 mm × 235 mm 16 开
印 张 9.5
字 数 132 千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目 录

引 言 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唯物辩证法 / 1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 5

第一节 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预见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 / 6

第二节 资本主义在曲折中前进:民粹和极端之殇 / 14

第三节 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 / 19

第二章 福利社会主义道路 / 34

第一节 福利社会主义的实验:福利国家的兴起 / 34

第二节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拯救 / 47

第三节 福利社会主义是一种贫富调适机制 / 61

第三章 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 76

第一节 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 78

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当行其道 / 88

第三节 完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未竟之事 / 99

第四章 大数据社会主义道路 / 107

第一节 从“后工业”到“大数据” / 107

第二节 大数据与社会主义 / 112

第三节 大数据社会主义的争锋焦点 / 115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122

第一节 社会主义道路包含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 / 122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三个一百年” / 128

第三节 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外有别 / 135

后 记 / 147

引言 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唯物辩证法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并在学界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不久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虽然书中有相当篇幅是在批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倾向，然而有趣的是，一位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关心未来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迷茫、矛盾和徘徊的时候，甚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听不到太多关于探讨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

原因何在？无外乎外因和内因两条。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改革开放让我们再一次“开眼看世界”，仿佛展开了一幅新的“海国图志”，西方的文明、西方的先进科技、西方的理念一下子涌进了国门，有如开闸泄洪一般，林林总总、应接不暇，哪里还有时间顾得上“炒老豆”呢？二是自己的问题。因为既有的道路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就开始不自信了。有的是对过去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疑虑和彷徨，有的是对未来社会主义道路产生顾虑和偏见。于是乎，谈论发达国家优渥生活的人多了起来，而谈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人



少了起来。这两条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归根结底是内因作用，也就是自己的原因所导致。可是没想到的是，那个时候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了。

时过境迁，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内部阶级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民主政治悖论和福利陷阱等。当年“东方”“西方”的状况，悄然发生着变化。西方学者似乎不再有那么多的闲暇去关心未来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更加聚焦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模式的发展和变异，诸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variety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体系论等都横空出世；与此相对，我们不再默不作声，也不再“言必称希腊”，而是发出了“中国声音”——无论是中国模式也好，还是中国方案也罢，虽然遭遇各种议论，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发展道路的探讨却是越来越多了。

这本小册子就是这几年我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思考，包括五种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这五种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在逻辑上并不等列。

就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而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与福利社会主义道路、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大数据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具有辩证关系。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几种道路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属种关系（即包含关系）。这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即“两个必然”决定的。“两个必然”是指资本主义必然会灭亡，以及社会主义必然会胜利——换言之，对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毋庸置疑之事实前提，因而每一种未来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哪一种）都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即未来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道路，这些未来社会主义道路也无一不统摄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之下。换言之，其他几种道路各自都具有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特征而不是所有特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包括这四种社会主义道路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道路普遍规律的升华。

另一方面，其他几种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这是由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即“两个绝不会”决定的。“两个绝不会”是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①。这是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重要表述。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之时或者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一天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高度成熟。而我们所要分析的福利社会主义道路和大数据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反映了近几十年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力快速提高并由此引发的科学技术（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快速进步和福利水平快速增加的情形；而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恰恰体现了近些年来人类对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的生态恶化与环境破坏的深刻反思，以及在这个反思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崭新关系，这种关系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福利社会主义道路和大数据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力”条件，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条件。

此外，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又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科学化、理论化与高度抽象化的过程，因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自身演进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体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②，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特征。其次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它具有中国特色，亦即中国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三者统一，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概言之，本书是一本探讨社会主义道路的书——然而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理解不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本书主要是一本探讨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书，这让我想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年轻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说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处于核心地位^①。以往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为什么产生和怎样产生。更具体地说，即以科学化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其内在规律。无疑，这一正向思维方法有助于大多数人理解社会主义的内在变迁，尤其是初始阶段的源起和发展状况，即对于社会主义的内在普遍性规律的揭示。然而，它并没有解释或者说没有倾向于解释为什么具有内在普遍性规律的社会主义至今无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普遍性（哪怕是相对而言的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我们打破上述传统的正向思维，从逆向来考虑：资本主义虽然历经波折，为什么暂时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所“必然”取代？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或许能够得到不一样的启发。

^① 王怀超、秦刚：《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第一节 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预见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

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将引发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坍塌：生产由资本家压榨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得以继续，价值的“剩余”会进一步引发生产商品的剩余——生产出来的商品将不可避免地逐步过剩——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无法完全消费掉这些生产。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家获取越来越多剩余价值的同时，工人变得越来越贫困，以至于他们无法消费完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于是历史上一幕幕荒诞剧发生了，如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人肆无忌惮地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其结果就是劳资之间日益增加的贫富悬殊导致供给和需求越来越不匹配，并将由此最终引发资本主义体系的崩塌。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相对地说却在减少”^①。因此马克思断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②

然而，在密西西比河倒奶事件发生之后的将近一百年时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计的那样。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预见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

我想这和两种阶级发生了变化有重要的关系——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从逻辑上看，这两种阶级并非一个层面，但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影响。

1. 工人阶级的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为生产的过剩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8，第5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是由于工人阶级日益贫困而消费不足导致的，供需不平衡之后向资本主义体系心脏插上一刀的正是由工人阶级沦落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但令马克思没想到的是，工人阶级的确在发生变化——不过不是按马克思预计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而是在别的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一，政治崛起。一方面，随着选举权利的推开与落实，无产阶级逐渐发现了自身的巨大潜力不仅仅体现在体制外的革命性，也体现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大。既然可以通过正常且安全的途径争取自身权益，那又何苦非要铤而走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呢？

以英美政治权利发展为例。英国平民和工人阶级取得平等的政治投票权委实经历了一番斗争。历史上的英国政治投票权一直是阶级区分的标志线。18世纪初，拥有600英镑以上财产者才具有成为郡议员资格，300英镑以上财产者才具有成为市镇议员资格。经过百余年漫长斗争，英国主要通过两个大事件发展了平民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第一个大事件是1832年选举改革，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①重新分配议会议员的席位。“衰败城镇”或人口少于2000的小城市（56个）的议员议席被取消，归并到邻近的郡区，另外，人口在2000~4000的市镇（30个）减少一个议席，将空出来的143个议席分配给人口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发达的郡。②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扩大选民队伍。该法实施后，城市和乡村共新增选民约20万人，比改革前选民人数增加45%左右。1867年、1872年、1883年、1884年、1885年又进行了几次大的选举制度改革。其中，1867年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资格，重新调整了某些议席的分配。各郡凡年收入5英镑者均拥有选举权，城市中租用不带家具的住房、在12个月内付租金达10英镑者也拥有选举权，这就使一些工人贵族拥有了选举权。1872年选举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把公开投票改为秘密投票。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及非常行为法》，规定了选举费用限额和选举舞弊的刑罚。1884年改革统一了城市与乡村选民的财产资格标准，城市工人也有了选举权。1885年选举发生了变化，将原来以郡、城市为选举单位产生议员的选区划分法，改革为以人口的数量为标准产生



议员的新选区划分法。

然而即便如此，英国选举制度仍具有三大不平等。一是男女投票不平等。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具有投票资格的年纪始终不同。二是学历不平等。学历高者可以多次投票，学历低的平民和工人阶级则不可以，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复票”制度。三是资本不平等。纳税额度高的资本家，每一票的票值相当于平民和工人阶级的数票。到了1918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男性公民从21岁起，妇女从30岁起，享有普选权，此外还降低了居住资格及收入限制，同时还建立了平等的选举区，但仍规定了部分人可以享有复票权。1926年，选民居住资格由6个月减为3个月。直到1928年，妇女终于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而第二个大事件是1948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宣布废除了营业处所、伦敦市和大学选区的“复票制”，从而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平等选举权制。

美国政治选举权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战役。第一个关键战役是选举权扩大到全体白人成年男子。19世纪30年代开始取消财产或纳税作为投票的门槛。而在此之前，资本（即财产或纳税额）成为白人内部的分界线。到1860年，所有州都取消了财产作为投票的门槛，只有4个州把缴纳一定税额作为投票的门槛。第二个关键战役是选举权扩大到妇女。1919年6月，国会通过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因性别原因剥夺任何公民选举权。第三个关键战役是选举权扩大到黑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开始了有色人种为了平等投票权而展开的斗争。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投票权利法开始有利于黑人选举权。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在实际上真正赢得了选举权。

与此同时，工会力量逐步强大，使得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合法平台谋得更多的政治资源。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权力资源理论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什么是权力资源？一个国家分配系统中二次分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两种权力：资方的资本控制权和劳方的人力资本控

制权^①。哪一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资源，哪一方就能够在生产分配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工会力量的壮大，劳方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人力资本控制权逐步增加，他们有了更多和资方谈判的筹码，可以尽可能争取更高的收入、福利及其他利益，以至于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工会利益集团”。权力资源之间的对抗性，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系统领域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一国福利供给和二次分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一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资源。在北欧，劳方所控制的权力资源相对更高，对资方形成某种制衡，所以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分配系统就相对发达；而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国家，或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国家，资方的权力资源禀赋相对更高，而工会势力相对较弱，从而使其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能力相对低于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国家。

于是，政治权利的逐步获得（虽然耗时漫长）与工会权力资源掌控能量的提升，使得政治上的崛起成为工人阶级自我蜕变的重要助推器。

第二，数量瓶颈。工人阶级要成为革命的原动力，其先决条件之一便是数量要不断增加，所谓“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革命方可成功。但现实情况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工人阶级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其劳动力的占比情况，都没有再增加。^② 革命主力军后继无人，则革命之势危矣。这是马克思万万没有料到的。

第三，自我分裂。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不仅剧烈，并且呈多面性的特征。工人阶级渐渐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分化出不同的群体。其中有极少数人通过各种机缘加运气摇身一变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浪潮有所提高而不再限于工人阶级水平；还有一部分人因

^① Korpi W,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并参见刘强军：《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发展述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98页。



为自身的懒惰或者运气不佳（比如因病致贫）而进一步贫困；更有甚者成了体制外的不稳定因素——流民，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广泛存在于广大的后发国家。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工作人员可能占到了劳动力总数的六成到七成^①。当然，这部分人只是工作不稳定但不至于居无定所，其中只有极少数会进一步沦落为流民。

而如果用上面提到的权力资源理论进行分析，那么阶级裂变的内在逻辑性则展现无余：其蕴含的逻辑悖论在于，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导致福利国家劳资双方权力资源的重组，从而使得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能力增强——阶级冲突因此得以缓和。但是，不断增强的二次分配以及不断扩张的福利供给，必然会引起劳资双方权力资源新的不平衡，从而再次引发更为强烈的阶级冲突。于是，缓和阶级冲突的解药却最终成为引发阶级冲突的导火索——阶级之间的进一步隔阂与裂痕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总之，工人阶级内部的自我分化乃至分裂，导致工人阶级很难再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有着如此一致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作为革命的动力。

2. 中产阶级的出现

工人阶级发生自我蜕变的一个重大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出现。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没有预见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在于他无法超脱于他所存在的历史，看到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转变为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是收入的增加。工业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的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创造出的价值为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不断提升的前提下（这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即便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

^①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98页。

论者也认同劳动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来源)，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得不给予劳动力更多的补偿，这意味着可变资本也会增加，这样还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创造的价值增加得更快。因此，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工人阶级的收入必然会增加。1850—1920 年英国资本/收入比的变迁情况可以佐证马克思的这一说法（见图 1）。资本/收入比越低，意味着资本存量越低，也说明国民收入相对于资本的比重更高；而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数十年它可以很大程度上衡量工人阶级的收入增加情况。从图中我们发现，1850 年时英国的资本总值相当于国民收入约 7 倍，而到了 1920 年只相当于约 3 倍，这说明在此期间英国的资本存量急速下滑，也意味着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国民收入在较快提升——而这部分群体在收入快速增长之后，也迅速转变为中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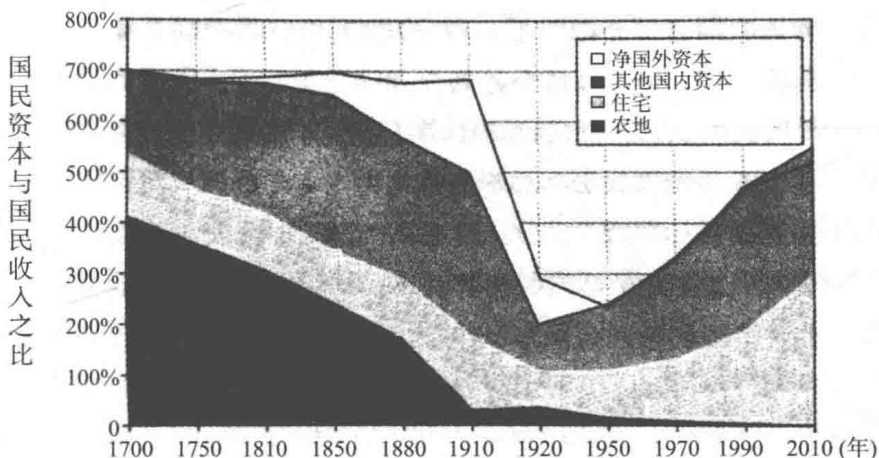


图 1 1850—1920 年英国资本/收入比的变迁

资料来源：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 9 月版，第 117 页。

然而，工人阶级收入的适度增加可以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其收入曲线（或者说可变资本的曲线）必定存在一个临界点——一旦超出，工人阶级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必然迅速减少，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仓廩实而知礼节”——既然过上了较为体面的生活，谁还想去革命呢？



二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否算作“资本”在政治经济学界仍存争议。但“技术”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则没有什么疑义。在工业革命早期和中期，技术的提升会促进职业的进一步分工，而专业性则会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无形中，工人身上的革命气质转变为中产阶级所特有的温和品性。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又和收入的增长相辅相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就把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舒尔茨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同时，他发现导致工人工资大幅度增长的因素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解释。他将这一部分归功于人力投资的结果。于是，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人力资本学说，其中心论点就是，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人力资源的提高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

进一步说，西方当前最为前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框架，在区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综合了权力资源理论，即加入了阶级、工会等左派政治因素，进一步把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划分为社会民主党的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并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形成的三个世界（three worlds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见表1）。换言之，这种思路是把技术、社会保障、教育投入、选举制度及党派等几个变量有机地联系起来，并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分析人力资本（不同技术类型的工人）是如何在不同的民主选举和福利保障制度下形成的。但人力资本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并未随着研究前沿的推进而变化。

换言之，以人力资本作为切入口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内部变化与外部迁移过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在内部变化方面，有工人阶级的裂变与中产阶级的兴替，在外部迁移方面，有国家间的差异性（既包

括经济的，也包括地缘的)，这些因素往往构成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因，进而产生人口迁移或劳动力转移。

表 1 不同的人力资本特点

	协调性市场经济体和比例代表制		自由市场经济体和多数代表制
	社会民主党	基督教民主党	自由派
日常护理或学前教育	高	低	低（但保证基本供给）
小学及初高中教育	高	中	中
高等教育	高	中	中（但保证基本供给）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高	低	低
职业培训	高	高	低

资料来源：Iversen T and Stephens J D (2008), “Partisan Politics,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ree Worlds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4-5): 600 - 637.

于是，一个自身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可以通过合法和理性的手段应付老板各种刁难的中产阶级，还会剩下多少革命动力呢？

三是福利国家的崛起。早在 19 世纪末期，德国的一些社会政策就已经具备了福利国家的雏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原因是为了抚平战争给人们尤其是那些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创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建立福利保障体系并逐步完善，使得大量因战争产生的无产阶级（尤其在欧洲）可以养老，基本生活得到“兜底”，以及获得就业培训——这部分人群成了战后福利国家中产阶级的基础。关于此部分内容在本书第二章还会详细谈及。

3. 未来：中产阶级会消失吗

可以说，工人阶级转变为中产阶级，是马克思没能预见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关键因素。但是，如同工人阶级的蜕变一样，中产阶级有朝一日会不会面临相似的境遇？甚至中产阶级有没有可能再蜕变为工人阶级？有几个潜在因素使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一，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如果说工业化时期的贫富差距拉大促生了中产阶级，那么后工业时代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则有